

1202 两情
history book



史家

金城出版社

萨苏 主编

朱鸿召

延安时代女性生活史

野夫

大国的革命与爱情

余世存

仇必和而解

萨苏

日本奇书——《延安水浒传》

邱江

陈华口述回忆：我与戴笠

中华女子学院



0424702

图书馆

1870.6
51
1202

史 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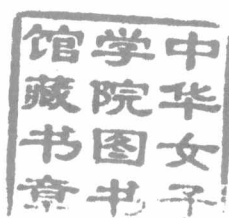


history meek

两情

萨苏 主编

金城出版社



中华女子学院



04247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客·两情 / 萨苏编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5

(史客丛书)

ISBN 978-7-5155-0431-5

I. ①史… II. ①萨…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1860 号

史客·两情

作 者 萨苏

策 划 么志龙

责任编辑 荣挺进

特约编辑 王林霞 常昕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31-5

定 价 30.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8637169

总 辑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本书编辑过程中仍有部分图片拍摄者无从查找, 请权利人与我社联系。

编者的话

“生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这是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描写乱世之恋时发出的感慨。

《史客》这一辑，所要讲述的，正是历史的情感——斯人已去，故事众口相传，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也不过是彼时的欢喜悲忧。其中，爱情，如花儿绽放，不论多么短暂，即使被岁月风干，已然保留下了盛开的姿态，后人见着，也能分辨出，它开在什么样的土壤里，留下怎样的馨香，历经过怎样的风雨。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万木生长，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情感的滋生，挫折、离乱都只会成为对蓬勃的砥砺。这里截取的是1935年到1945年间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大多是抗战时期国人的爱情。我们并没有选择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鸳鸯蝴蝶、风花雪月的恋情，而是选择了革命、战争、隐蔽战线等特殊环境下发生的爱情，比如延安的恋情，比如敌占区的恋情。我们试图调动不同观察者的笔，勾画那个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年代中国人的情感史。

我们不刻意挖掘花边新闻，因为我们不仅仅关心男女两情，更关心藉由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折射出的宏阔的历史，以及爱情选择与主人公一生命运之间的联系；我们也不仅仅停留在这十年，而是将视线延伸到之前和之后的漫漫红尘。时间犹如滔滔江水，这些人和事，也许不过是流转的浮萍，随着承载他们的拍案惊涛逶迤而去。人在事中或不自知，后人观之，当有所思。所谓后浪推前浪，每个人都裹挟在历史的巨浪中，受其影响，被其左右。野夫在《大伯的革命与爱情》中说：“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年代的邂逅相逢，几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样，开始他们乱世佳人的孽缘。那一年，他们也都才十八九岁啊。蠢蠢萌动的春心，放在国破山河之下，仿佛预示着他们破碎的今生。”

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掩卷沉思，除去尘世的浮华与落寞，彭德怀与浦安修，沈霞与萧逸，我大伯与王冰松们的命运其实都是相似的，他们的爱情与他们所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以及后来那些不堪回首的年代都休戚相关。

对于历史，我们常常想当然。站开距离，冷静的观察、剖析是需要的，但不能预设立场，曲解了历史的本意；设身处地、“同情的理解”那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包括话语环境，才能重新拨动旧日的心弦，不至生出隔膜和误解。历史，更需要历史人物自己的声音。比如丁玲的秘书王增如，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从她们的笔下还原了革命话语中的情感方式，那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自身的逻辑。而茅盾的女儿沈霞，一个革命圣地青春少女的日记，坦露的内心独白；戴笠的红颜知己陈华，一个上海滩风云一时的女人，绚烂归于沉寂后平静的诉说，所呈现出的，都是感情的原生态，和事情的本来面目。

我们无意做任何比较，也无意做任何褒贬。这里记述的，无论贤愚，无论贵贱，都是我们父辈甚至祖辈的故事。阅读他们的一生，让人唏嘘感叹，直至怦然泪下。感动之余，我们会平添一份仰视，因为正是有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作为今日生活的基石，才垫高了今人的视角。

最后，特别感谢著名延安历史专家朱鸿召先生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编 者

2012年5月4日

史 客

目录

朱鸿召	延安时代女性生活史	1
田 涌	延安往事	30
朱鸿召	被遗忘的延安丽人吴光伟	53
	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	60
裴毅然	“多情而聪明”的唐纳	80
王增如	有一种爱情叫真挚	86
裴毅然	老延安胡绩伟的非常婚恋	100
郭晓惠	诗人郭小川在延安（1941—1945）	106
刘守华	尘封六十年日记 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	116
裴毅然	延安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128
萨 苏	日本奇书——《延安水浒传》	147
余世存	仇必和而解	168
张耀杰	高陶事件中的万冰如	178

野 夫	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185
吕 雁	留得重逢相对流	209
邱 江	羊城之恋	219
	陈华口述回忆：我与戴笠	229

附：延安爱情地图

朱鸿召

延安时代女性生活史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风景。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队伍里，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也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

一、奔赴延安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指何、陈——引者注）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1〕}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

〔1〕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35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陈学昭（1906—1991），浙江海宁县人。1923年在上海爱国女学文科毕业后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受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文坛大家的教诲和帮助。1927年5月赴法国留学，1935年初获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1938年首次去延安。1939年初，发表《延安访问记》，1940年11月再次奔赴延安。图为陈学昭去延安前后的留影。

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2]”。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再次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看待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更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给她们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

[1] 温崇信祖籍广东梅州，生于江苏扬州，留学美国，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游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女儿到延安后，就与其断绝了父女关系。

参见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第10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 黎辛《我说说夏沙》，手稿。

限畅快感。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年龄幼小，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

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像个假小子。

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1〕}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细节。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都街头的宣传活动一度非常火热。时在中华女子中学初中读书的孟子，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生来一副好嗓子，积极参加学校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茶馆、集镇去唱歌演讲。她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演唱着东北人民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歌谣《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爹娘啊，爹娘啊……”，被父亲获悉，得到的严厉呵斥是：“我还没有死，你就哭了？”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顿狗血喷头的狠骂后，保证以后不唱了。

不久，她又参加宣传活动，在茶楼里演唱另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当兵》（老舍作词，张曙作曲），被一位父执朋友听到了。这位关心她的长辈当晚就转到她家，对她父亲说：

“你闺女的戏唱得好呀！”

〔1〕 阎明诗《总理送我上征程》，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4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宝塔山下，延安曾让世界为之瞩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奔向她的怀抱。

“什么戏？”父亲不解地问。

“哼，什么戏！‘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啊？这还了得！没出嫁的姑娘怎么到大街上、茶楼里唱歌唤夫君呢？这还成何体统？还有什么脸面呢？又一次更加严厉的训斥责骂，并违心地再作保证下不为例。^[1]

可是，烽火连天，国土沦丧，青春热血为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所鼓舞，孟于再也忍受不了旧家庭和社会的束缚，1939年7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生，她毅然报考并被录取。“我和李仲民是偷偷从家里出走的，出发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请不要找我们……”^[2]半年后，她和伙伴们终于从宜川转赴延安。

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

[1] 孟于接受朱鸿召电话采访记录，2002年7月12日，北京、上海。

[2] 孟于《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延安》，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289页。

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1]

对于大家族的叛逆，对于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的选择。在奔向革命队伍的知识女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其中：

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

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为特别班的程度。

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

包括不同的21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人为最多，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为最少。此外，还有一个台湾人。^[2]

[1]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1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 《王明同志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妇女》（延安），第1卷第3期（1939年8月）。

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共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争取女权的象征。女大只存在两年时间，学员主要是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女生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办的妇女培训班抽调归并，或公开招生而来，在延安革命女青年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她们接受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阐述，相信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翻身解放，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只有在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

二、激情燃烧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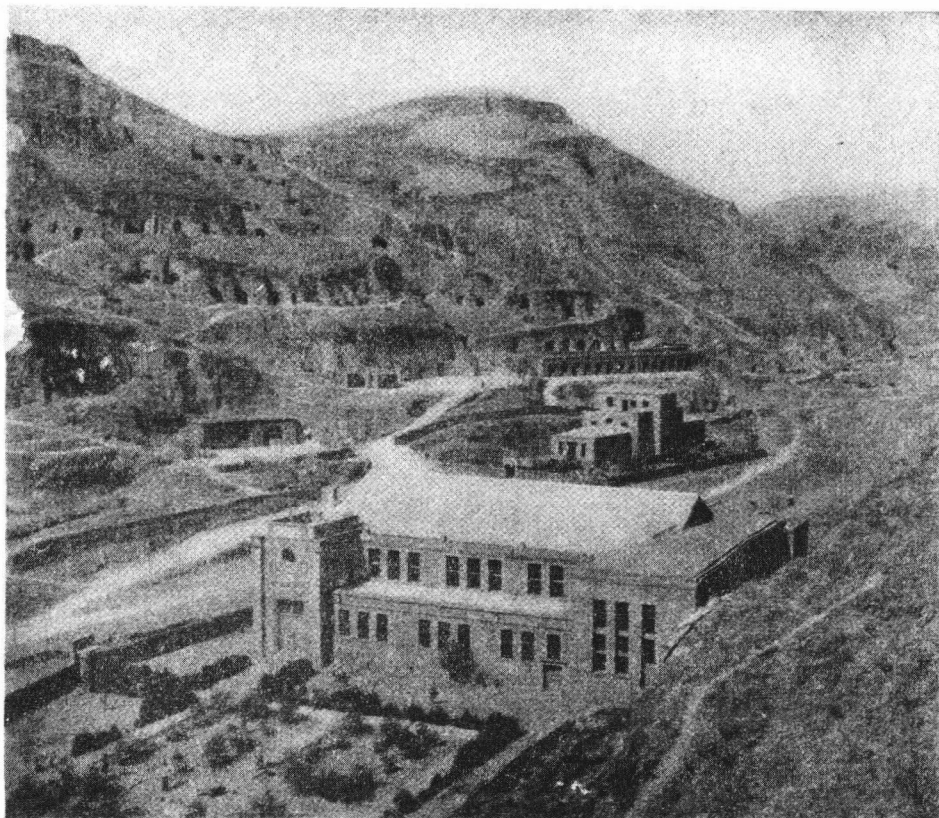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集体生活炼就了她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

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到达延安的初夜通常都被安排住在城里的招待所或南门外的西北旅社，食宿全部免费。延安以自己的方式，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叛逆者。这些生长在村镇大家庭或城市殷实人家的知识女青年，初进延安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奇。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来到延安。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自1936年底从东北军手中接管过来以后一直保存完整。傍晚时分，这支小分队步行进了延安城，“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于蓝和与她一起到延安的伙伴赵路到了招待所，



杨家岭全景图。近处正中即是于蓝初到延安时看到的那座非常洋派的建筑——中央大礼堂，山下右侧建筑为中央办公厅楼，山腰窑洞，由右至左，分别为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故居，中央统战部、宣传部、组织部等机关，也都在这里。

放下背包，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她们自己却轻轻地跑出去玩了。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穿着灰色、蓝色制服的“公家人”，与坐商行贾的老乡们和平买卖交易着。来到十字路口，她们看到很多人涌进一座非常洋派的教堂改制的大礼堂。“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进去了。只见里边黑糊糊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1]还有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的场面，

[1] 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第34~3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原来是一座基督教教堂，后于1942年改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礼堂。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除了用于召开会议之外，周末和节日的时候，还举办舞会，也是延安的文艺中心。

话剧演出等节目，更是令她们耳目一新。看过晚会，别人都散场了，她们才想起来自己今晚不但晚饭没有吃，而且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睡呢！

赶快按照原路找到招待所，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进出延安的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生活相对民主，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

在火热的救亡革命气氛里，身穿制服的革命女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的增多了，一些青年的学生们——抗大与公学的学生——生气勃勃的穿过街心，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走在行人密密的街头，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的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图为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学生在延安街头演出（1943年）。



上男人呢！”次日早晨，就是1938年的新年元旦。“太阳射出那万丈光芒，风也停止了！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带着马，穿上‘老资格’的军服走到旷野里去，它们兴奋的，快乐的跑着马，说着，笑着，简直是一群群天使，他们几乎忘形了！跑得够了，大伙围在一块野餐，他们的食品，不会有什么洋套，而是这里出产的核桃、花生、南瓜子，看他们真吃得顽强起劲，‘欢迎××唱歌’‘欢迎××跳舞’的高亢声音，不时的由他们的圈子中吼出来，静下去，继着就是个人或几人的唱歌跳舞，他们毫不拘泥，他们毫不顾虑。”^[1]曾经叛逆的斗争和长途跋涉的艰难，都兑换成了对于延安革命圣地的热情崇拜和万丈豪情。走在延安的街头上，她们甩甩手，手是自由的；踢踢脚，脚是自由的；扭扭脖子，伸伸腰，感觉到哪里都是自己的了，再也没有了曾经在那个中产阶级旧家庭里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她们尽情享受叛逆、解放、革命带来的无限畅美的最初体验。所以，当她们群体出现的时候，相互感应，彼此激荡，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夸张身体扭动的幅度，不时地发出夸大其词的惊叹与尖叫。

在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来延安的旗帜下，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工作一度得到普遍重视。

1938年3月8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并同时宣告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联”）。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

[1] 烈群《新年的延安》，《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5~26日。

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1]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中国女子大学前后享受着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当时我们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还以为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同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回想我们几个队干部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

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盛夏时分，几个同学相约到河边沐浴，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待下衣干透，着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

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2]

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1] 烈群《新年的延安》，《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5~26日。

[2] 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第275~276页。